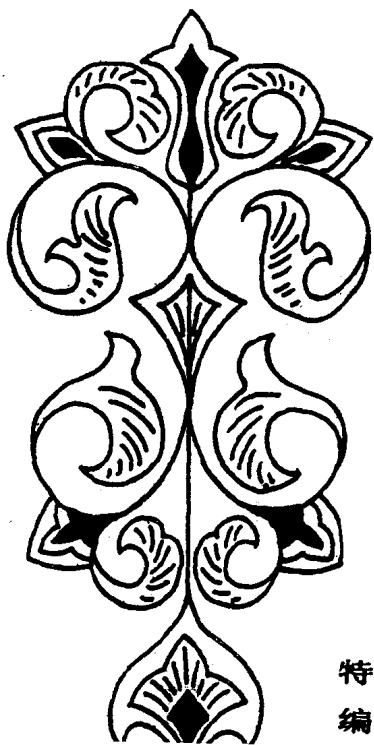


俄国文学史



特约顾问：戈宝权
编辑小组：易漱泉
雷成德
王远泽

湖南文艺出版社

俄 国 文 学 史

易漱泉 雷成德 王远泽等

责任编辑：唐维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12,000 印张，21.5 印数，1——6,800

统一书号：10456·7 定价：4.35元

新书目：86—8

目 次

俄国文学与中国（代序）	戈宝权（1）
第一章 总论	（23）
第二章 十九世纪前俄国文学概述	（38）
第一节 社会历史概况	（38）
第二节 文学发展概述	（44）
第三节 杰尔查文	（52）
第四节 冯维辛	（59）
第五节 拉季谢夫	（67）
第六节 卡拉姆辛	（76）
第三章 十九世纪初期俄国文学概述	（84）
第一节 社会历史概况	（84）
第二节 文学发展概述	（89）
第三节 十二月党诗人	（97）
√第四章 普希金	（106）
第一节 生平	（106）
第二节 抒情诗和叙事长诗	（112）
第三节 戏剧	（122）
第四节 小说	（127）
第五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	（134）
第六节 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48）
第五章 莱蒙托夫	（151）
第一节 生平	（151）
第二节 抒情诗和叙事长诗	（155）

第三节	《当代英雄》	(166)
✓ 第六章	果戈理	(175)
第一节	生平	(175)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	(185)
第三节	《钦差大臣》	(194) ✓
第四节	《死魂灵》	(202) ✓
第七章	别林斯基	(217)
第一节	生平	(217)
第二节	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观点	(223)
第三节	美学观点	(229)
第四节	文学批评	(238)
第五节	别林斯基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247)
第八章	赫尔岑	(250)
第一节	生平	(250)
第二节	哲学与文学观点	(256)
第三节	《谁之罪》及其他	(267)
第四节	《往事与随想》	(274)
第九章	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文学概述	(281)
第一节	社会历史概况	(281)
第二节	文学思想斗争	(286)
第三节	德鲁日宁、安年科夫等人的创作	(291)
第四节	乌斯宾斯基等人的创作	(297)
第五节	奥加辽夫、皮萨列夫等人的文学批评活动	(303)
第六节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308)
第十章	屠格涅夫	(315)
第一节	生平	(315)
第二节	诗歌和戏剧	(323)
第三节	《猎人笔记》	(332)
第四节	小说	(337)
第五节	《父与子》	(343)

第十一章 冈察洛夫	(356)
第一节 生平	(356)
第二节 长篇小说	(362)
第三节 《奥勃洛摩夫》	(371)
第十二章 涅克拉索夫	(382)
第一节 生平	(382)
第二节 抒情诗和短篇叙事诗	(387)
第三节 长诗	(395)
第四节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401)
第十三章 奥斯特罗夫斯基	(410)
第一节 生平	(410)
第二节 戏剧创作	(415)
第三节 《大雷雨》	(424)
第四节 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俄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436)
第十四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	(440)
第一节 生平	(440)
第二节 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	(443)
第三节 美学观点	(447)
第四节 文学批评活动	(452)
第五节 长篇小说《怎么办?》	(460)
第十五章 杜勃罗留波夫	(468)
第一节 生平	(468)
第二节 哲学、政治和文学观点	(471)
第三节 文学评论的“三部曲”	(488)
第十六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	(495)
第一节 生平	(495)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	(500)
第三节 长篇小说	(504)
第四节 《罪与罚》	(511)
第五节 独特的艺术风格	(517)

第十七章 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文学概述

.....(521)

第一节 社会历史概况(521)

第二节 文学发展概述(526)

第三节 柯罗连科(539)

第四节 绥拉菲莫维奇(542)

第十八章 托尔斯泰(546)

第一节 生平(546)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552)

第三节 戏剧(560)

第四节 文学论著和政论(565)

第五节 《战争与和平》(570)

第六节 《安娜·卡列尼娜》(577)

第七节 《复活》(585)

第十九章 契诃夫(593)

第一节 生平(593)

第二节 短篇小说(601)

第三节 《草原》、《第六病室》和《套中人》(611)

第四节 戏剧(621)

第二十章 高尔基(634)

第一节 生平(634)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641)

第三节 诗歌(651)

第四节 戏剧(656)

第五节 《母亲》(666)

编后记.....(676)

俄国文学与中国(代序)

戈 宝 权

“俄国文学是我们的
导师和朋友。”

——鲁迅

—

我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早在五十年前1932年12月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就讲到俄国文学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介绍到我国来的情况以及它所发生的巨大影响：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按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

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介绍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①

鲁迅在同年9月为他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写的前记中又说：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

①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460页。鲁迅提到的《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应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见1921年第12卷第10期的《小说月报》。

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①

仅从鲁迅所写的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远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这些卓越的作家为代表的先进的俄国文学，就同中国的文艺介绍工作者和广大的读者发生了关系。由于俄国的文学作品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成长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二

俄国文学受到中国的文学工作者和广大的读者的普遍热爱，并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由于俄国文学是种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是种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意义的文学。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在他未完成的《俄国文学史》手稿的序言中讲得非常好：

俄国文学特别富有教育意义，就其广阔面而论更特别重要——没有一个问题它是它所不曾提出和不曾企图去解答的。这主要是一种提问题的文学，它提问道：

怎么办呢？

哪里更好些呢？

谁的罪过呢？

我们的文学可以适当地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因为社会的必要性而宣传民主主义的贵族文学，另一条也是因为社会的必要性而宣传社会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文学。

①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然而，无论是这一条或是另一条路线，对于我们都是同样有历史价值的，因为它给予我们以最丰富的材料，好去判断俄国思想的道路，各不同社会集团的任务，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使得我们相信：任何一个集团，要是没有广大的民主主义的群众的参加，便显得完全无力，完全没有可能去解决它本身的任务。①

高尔基对于俄国文学的这几段论述，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所说“问题的文学”，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差不多所有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提出了他们要解答的问题。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囚禁期间写成了副标题为“新人的小说”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2—1863）。如涅克拉索夫花了十三年的功夫完成描写俄国农民寻求幸福与真理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如赫尔岑在流放中写成关于家庭悲剧的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6—1847）；他在这部小说的结尾时说：“任凭读者去解决：谁的罪过？”至于在俄国文学中，从普希金起就创造出了不少“多余的人”的形象，如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和《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一直到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继之而起的是“新人”的出现，如屠格涅夫先后在小说《前夜》和《父与子》中创造出了叶琳娜和巴扎洛夫的形象；如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剧本《大雷雨》中创造出的卡杰林娜，被视为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如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中创造出了革命家西蒙生等人的形象；但只有在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才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家巴威尔。所

① 《高尔基文选》第一卷第4—5页，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39年版，此书有廖灵珠的译本，1956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这一切，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显示出了作为“问题的文学”的俄国文学的特色。

高尔基提到的俄国文学的两条路线，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三个主要阶段的论述。“这三个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①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又曾这样写道：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并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跟前开始增长。^②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同俄国解放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阶级正是相适应的，而且每个时期都出现了相应的作家和诗人：从十二月党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经过别林斯基、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罗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直到高尔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组成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光辉的历史。

在这里应该提到的，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们都热爱俄国文学。马克思在五十岁时才开始学习俄语，他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普希金、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德林等人的著作。恩格斯曾把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个别章节译成德文。列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读过大量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说：“他最喜欢普希金”，他也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和思想很有研究，他曾写过六七篇专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列宁和高尔基之间有深厚的友谊，他对于高尔基的论述和他们相互间的通信，成为研究他们友谊的重要文献。

三

俄国文学作品最早在什么时候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呢？据我多年来的研究和发现，最早就当推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的戛翼翠根据日文重译的普希金原著《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但最初由于找不到这个译本，因此无法从译名上来断定它是本什么书，直到后来发现这本书之后，才知道这就是普希金的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我国最早翻译介绍俄国文学作品，是从普希金的名著开始的，这虽然是个巧合，但却是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事。

继此以后，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棹从日文转译的莱门忒甫（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即《当代英雄》的第一部《贝拉》）和溪崖霍夫（契诃夫）的《黑衣教士》。香港的礼贤会出版了

德国叶道胜牧师翻译的《托氏宗教小说》，其中选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十二篇宗教题材的民间故事。同年的《东方杂志》第一至第四期上连载了吴棹翻译的戈厉机（高尔基）的小说《忧患余生·原名《犹太人之浮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就在同一年，鲁迅用令飞的笔名写了《摩罗诗力说》（于1908年发表在《河南》月刊上），其中介绍了普式庚（普希金）、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和鄂戈理（果戈理）等三位俄国作家。这可说是我国最早评介俄国文学的论文。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A·K·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俄王义文第四专政史：不测之威》（即《谢列布良尼大公》）。1909年《小说时报》上发表了天笑生翻译的奇霍夫（契诃夫）的小说《六号室》（即《第六病房》）。同年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编译的两本《域外小说集》在日本东京出版，其中译有迦尔洵的《邂逅》和《四日》，契诃夫的《威施》（即《在庄园里》）和《塞外》（即《在流放中》），安特来夫的《漫》和《默》等小说。迦尔洵的《四日》和安特来夫的两个短篇，俱出自鲁迅之手。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191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马君武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名著《心狱》（即《复活》）。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本托尔斯泰的作品，即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罗刹因果录》（其中收了托尔斯泰八篇宗教题材的民间故事）、雪生翻译的《雪和围》（即《主与仆》）、朱东润翻译的《骠骑父子》（即《两个骠骑兵》）。同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小说界》上发表了刘半农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四篇散文诗：《乞食之悲》（即《乞丐》）、《地胡吞我之妻》（即《玛莎》）、《可畏哉愚夫》（即《愚人》）和《黎妇与菜汁》（即《菜汤》）；《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第一卷第一至第四号上连载了陈赅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1916年《小说海》杂志上发表了刘半农翻译的高尔基的《廿六人》（发表时未署原作者的姓名，实即高尔基的《二十六男和一女》的前半部）。《新青年》上又连载了

陈馥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另一篇小说《初恋》。《小说名画大观》上发表了马君武翻译的托尔斯泰的《绿城醉客》(即《卢塞恩城》)。同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陈家麟和陈大镗合译的《风俗闲评》上下两册,其中收了契诃夫的二十三篇短篇小说。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陈宗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社会声影录》,其中收了《尼里多福亲王重农务》(即《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刁冰伯爵》(即《两个骠骑兵》)两篇小说。《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们两人合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人鬼关头》(即《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家麟和陈大镗合译的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和朱世奏翻译的《克利米亚战血录》(即《塞伐斯托波尔的故事》)。在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俄罗斯之部”中,翻译了杜蓬纳夫(屠格涅夫)的《死》,托尔斯泰的《宁人负我》(即《上帝知道真情,但不立即讲出来》),高甘(高尔基)的《大义》(即《意大利童话》中的第十一篇童话)和盎颀利夫(安特列夫)的《红笑》。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即《幼年·少年·青年》)。《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托尔斯泰、梭罗古勃、库普林和安特列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部在1920年印行的《点滴》小说集上下两册中。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其中收了《波子西佛杀妻》(即《克莱采奏鸣曲》)和《马莎自述生平》(即《家庭幸福》)。此外,林纾和陈家麟还合译过托尔斯泰的《球房纪事》(即《台球记数人的手记》)、《乐师雅路白忒遗事》(即阿尔伯特)和《高加索之囚》,都先后发表在1920年的《小说月报》上。从我国自民国初年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情形来看,当时我们已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迦尔洵、安特来夫等十几位俄国名作家的作品约八十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即

将近三十种。这些作品虽然多半是根据日文和英文转译，而且又是用文言文翻译的，但无论从总的数量上来说，还是从选译的作家和作品的代表性来说，在“五四”以前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四

我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我国当时的先进分子都曾热烈地欢迎了十月革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为“新青年”写的《庶民的胜利》中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又指出：“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鲁迅曾说过，他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郭沫若也曾说过：“应该感谢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新社会产生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

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让我们对俄国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并为我们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和稍后新兴的苏联文学作品指出了新的方向。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即1920年，北京的新中国杂志社就出版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集前印有瞿秋白和郑振铎两人写的序文，小说集中收有普希金的《驿站监察史》和《雪媒》（即暴风雪），果戈理的《马车》、赫尔岑的《鹊贼》、屠格涅夫的《九封书》（即《浮士德》）等九篇小说。接着，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又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其中发表了由鲁迅、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等许多人撰写的二十篇论文，上起普希金、下迄高尔基为止的小说作品二十七篇。此外还初次翻译了赤色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即《国际歌》）。

随着共学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俄国文学的译本相继大量涌现，而且不少作品都是从俄文直译的。共学社在1921年到1923年专门编译了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在散文作品方面，就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安寿颐译），屠格涅夫的《前夜》（沈颖译）和《父与子》（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复活》（耿济之译）和《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耿济之、瞿秋白合译），柴霍甫（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耿济之、耿勉之合译）。在戏剧作品方面，1921年就专编有一套《俄国戏曲集》，其中译有果戈理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叔》和《樱桃园》（耿式之译）。此外，共学社在1922年还出版了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光》（邓演存译）和《活尸》（文范邨译）、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郑振铎译）和《罪与愁》（柯一岑译）以及安特列夫的《比利时的悲哀》（沈琳译）等剧本。文学研究会的丛书中，在1922年出版了安特列夫的《小人物的忏悔》（耿式之译），1923年出版了安特列夫的《人之一生》（耿济之译）和《狗的跳舞》（张闻天译），1926年出版了柯罗连科的《盲乐师》（张亚权译）等作品。

继此之后出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在1924年有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普希金小说集》（赵诚之译），1925年又出版了《俄罗斯名著》第一集（李秉之译），其中译有克雷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人的作品十二篇。1926年北京未名书店出版了果戈理的《外套》（韦漱园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韦丛芜译），鲁迅还专为《穷人》写了《小引》印在书前。

就在这个时期，随着翻译介绍俄国文学作品工作的发展，也开始了研究工作。沈雁冰（茅盾）早在1920年写的《俄国近代文学丛论》中，就提出了俄国文学的社会意义，他说：

俄国近代文学都是有社会思想和社会革命观点。……俄人视文学又较他国人为重，他们以为文学这东西，……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有用于人生^①。

因此他就提出了一个要翻译介绍的书目，其中即有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父与子》和《处女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白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河夫的戏剧作品以及高尔基的小说等。

瞿秋白也指出：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很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音，真是空谷足音，不由你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②。

这时除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如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振铎编著的《俄国文学史略》，1927年泰东图书局出版了瞿秋白和蒋光慈两人合写的《俄罗斯文学》。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从英文翻译的俄国文学史，即如1931年出

① 见《小说月报》，1920年2月第11卷第2号，《编辑余谈》第1—2页。

② 见《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卷第543—544页。